

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文学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蜕变的描述及
社会文化背景论析

韩宇宏◎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I206.7
H102

公
◎
著



郑州大学

04010227442Q

剧
烈
变
动
中
的

社会与文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蜕变的描述及
社会文化背景论析

1206.7

H102

date 7/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文学: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蜕变的
描述及社会文化背景论析/韩宇宏著. - 郑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2004.9

ISBN 7-215-05520-5

I. 剧… II. 韩…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873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31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目 录

“世纪之交”:从自然时序到文明阶段(绪论)	1
第一章 现代革命正在发生	10
第一节 文学的边缘化	11
第二节 文学的市场化	30
第三节 文学的非文学化	53
第四节 自由撰稿人	77
第五节 变异的批评	88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与道德颠覆	
——略论当前的社会文化转型	106
第一节 世纪之交中国所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	106
第二节 危险的倾斜	114
第三节 失范的文化	124
第四节 扭曲的世风	138
第五节 突围的奋争	155
第三章 在世界文化洪流前	
——世纪之交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166

第一节	“全球化”或“一体化”	166
第二节	产业化与个人化	174
第三节	荧屏文化中心化	191
第四节	文化的快餐化、消费化浪潮	223
第五节	文化发展上的“马太效应”问题	238
 第四章	 路在脚下延伸	 246
第一节	寻找定盘星	246
第二节	破解文学的司芬克斯之谜	252
第三节	高扬倡导的旗帜	257
 后 记		 263

“世纪之交”：从自然时序到文明阶段

（绪论）

几年前，当我确定这一选题的时候，对于“世纪之交”这一概念并没有考虑很多，不过是因为到了世纪交替的时候而已；“世纪末”这一提法，由于在许多文化语境中，例如我国及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区，都带有某种并非中性的特定含义，不大好听；同时我还感到，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无论社会还是文学自身，这个巨大且深刻的转型蜕变，到世纪末（去掉任何主观评价的纯自然时序概念）似乎还远远未必能够完成。于是，我选择了“世纪之交”这一更富弹性的提法。然而，当课题研究展开一段之后，我才发现“世纪之交”并不仅仅，也不应该只是一个自然时序的概念。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全世界、全人类，在这个世纪之交，都是我们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这个世纪之交便不能不带上特有的文化内涵且主要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一）

我们所采用的、目前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其前身为“儒略历”；儒略历因被罗马统帅儒略·恺撒采用而得名。是在公元前46年，直到公元6世纪，现在的纪年方式才开始通行于世界各国。而此前人类的文明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上。虽然它以传说中的耶稣

降生之年为开始标记,带有后来基督教文化的色彩,但是,就其纪年的数序和世纪数序而言,仍然是偶然性的;对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它并不具有标志性意义。就是耶稣生活的罗马帝国,由贵族民主制向军事独裁制的转变,也发生在此前的半个世纪左右。而这时,我们中国正值西汉向新莽政权交替的时期。攫取了汉家皇位的主莽,虽在各方面都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历史学家怎样评价,我们这里姑且做中性看待)举措,但且不说随着刘秀东汉政权的建立,那些改革措施也都和新莽政权一样的短命,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新莽政权再长命些,其各项改革也都能取得相应的预期效果,恐怕也根本不会使那时的社会发生多少质的改变。因此,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这个公元纪元最初的世纪之交,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社会文化价值,换句话说,它只是个单纯的自然时序而已。

还可以回想一下公元 10—11 世纪的世纪之交(这也和时下一样,正是个千年之交)。从全国政权割据的面貌及历史的王朝兴废更替看,并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北宋王朝的建立与五代十国的结束,都发生在 20 多年乃至 40 年之前。(赵匡胤即位于公元 960 年,南方最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泉、漳二州,归顺在公元 978 年)至于辽和西夏的建国,更在此前此后的很多年(辽之前的国名为契丹,建于公元 916 年,改国号辽于 947 年,为金所灭是在 1125 年;西夏建国于 1038 年,被蒙古灭于 1227 年),都与世纪更替无关,至少联系并不紧密。倘若从重大的社会文化事件着眼,倒有几件事可以一提:公元 998 年,宋真宗赵恒即位当年便让孔子后裔孔延世袭为“文宣公”(不过,“文宣公”的头衔却是宋太宗封给孔延世之父孔宜的);10 年后他又亲到泰山祭祀,并到曲阜孔庙行礼。在尊儒的同时,真宗亦扬佛倡道,尊玉皇为“玉皇大帝”;逐渐形成意识形态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而 1005 年辽宋之间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北宋企图以武力统一北方的历史。但是这些仍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许

多事情的开端、起因都远在真宗朝之前很多年。例如太祖朝的“杯酒释兵权”及倡道扬佛,太宗朝开始的尊儒等等。所以,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这个变动也不能以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为标志;而且,虽然这个变动确曾给中国此后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极其深远、巨大的影响,但就整个社会性质、人的文明发展来看,也还不能给以划时代意义的估量。

上一个世纪的世纪之交,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轰轰烈烈、发生了惊天动地巨变的世纪之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继之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使中国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政治上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思想文化上批判了封建,引进了科学、民主及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上引入了平均地权和发展资本(即新的工业经济制度,这是就整个国家经济而言,而不是专指某一阶层的资本)的变革;整个社会结构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且不说中国广大农村的变化甚微,真正重大的、本质性的变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如妇女解放、平均地权),或70年代末才发生;即使这一切变化都集中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它也远无法和眼前的世纪之交相提并论。因为,那意义无论如何还只限于中国这一个国家内;而目前的变化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

我们面前这个向21世纪迈进的“世纪之交”却不同,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世纪之交”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时间概念、历史时序概念,而是世界史、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概念。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未来学名著《第三次浪潮》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第55页)他在书的《序言》中断言说:“不论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从事抵制或者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文明。”而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正是为帮助人们作出各自的“选择”。(同上,

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中国,是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文化类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在世界,则是结束了人类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热战”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性对峙而走向和平对话的时代。当年的“冷战”对手,如今已纷纷建立起“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用政治家们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世界正在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亦不时有文化多元化的各种小插曲出现,甚至有例如亨廷顿的“文化冲突”之说)的时代,一个科技发展、知识爆炸、信息密集的时代,一个“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一个新的发展观、人类观、世界观确立的时代。这就是最后被确定、并在全世界迅速达成共识的“知识经济时代”。

大家知道,知识经济时代,也曾被称为“后工业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等,而自 1996 年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1996 年科学、技术与产业展望》中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研究报告,并对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作了全面论证之后,“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才被全世界所接受;1997 年 2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次讲演中不仅采用了这一概念,而且公开声称,美国即将到来的“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于是,“知识经济”开始成为正式的官方文件用词。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前现代”即尚未充分实现工业经济指标的发展中国家据权威部门研究,我国目前处于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处在农业、工业和知识经济“三元经济”并行发展的时期。资料表明,如果把美国现有水平作为一个发展标准以 1 来衡量的话,我国仅有 0.26,即仅及人家的 1/4。我国 1996 年知识产业发展度为 23.6%,还不及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 29% 的水平。(《我国处在知识经济萌芽阶段》,转摘自 1999 年 1 月 7 日《文摘报》),“知识经济”也已经成为各种传媒近两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知识经济就是高技术、高智力、高文化融为一体的现代经济;是以知识及其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是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基础的(这个基础也正是

在世纪之交才得以初步形成)高科技含量、高科技贡献率的经济。这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与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衔接的、崭新的文明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的到来,是以20—21世纪的这个世纪之交为标志的。于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世纪之交”就不再单纯是原自然时序内涵的概念,而成为富有充分文化内涵的概念,一个十足的文化概念。

知识经济还意味着发达国家科技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将更为加快,从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的周期和技术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将更为缩短,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通过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经验,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度将更为增大,“后发优势”的作用将更为减弱。这就是挑战的严峻性所在。世界银行在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促进发展的知识》(提纲)中,把这种情势形象地称为“要么搭上车,要么更落伍”。身处这样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人也就又多出一份格外庄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二)

这倒还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琢磨和寻思,稍稍考察一下我们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话语场,也会发现上述世纪之交由单纯时序向文化概念演变的某种踪迹。1974年,当时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曾抱病在全国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提法就是:“到本世纪末,……中国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尽管这里的“现代化”概念远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理解,但这个“世纪末”却被多少赋予了政治和社会的内涵,而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时序。80年代以来这个提法更加频繁,也更加响亮起来;其非自然时序的内容也更加明确。这一点与邓小平同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

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4页)在这一篇文章的结尾他再次强调了“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时隔不久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77页)这里,“本世纪末”又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某一阶段性的标志,是某个更为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一部分;而不再仅仅是权宜性的时间说明,不再是时间的偶然巧合。问题更在于,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国社会必须更坚定地转型。这就有了:“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8页)“开放不坚决不行”,“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7页),以及“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3页)从而,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确立与实践上的迅猛发展,进而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

(三)

中国文学的蜕变,就发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性话题。就其世界性的一面而论,例如,当我们议论文

学地位“边缘化”，文学生存困难时，美国也在惊呼文学的生存危机，法国人（批评家迪迪埃·《今日法国的文学批评》）介绍说，“文学杂志很困难地维持着”（摘自《文艺报》1998年12月31日），德国人也在谈论文学的存在价值，讨论如何改变中学生不知德国文学经典的问题；当我们谈论视听文化冲击时，西方也在议论多媒体的挤压；当我们谈论文学批评的“失语”、“缺位”、“变味儿”时，西方学者也发出“理论的否定性和批评特性，则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的警告。（见《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可见，这些都是具有世界共性的问题。就中国独特性一面而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不仅仅是题材、主题、人物、叙述方式、艺术风格、创作思潮甚至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而且是包括文学的社会地位、文学的创作动因、文学作品的呈现形态、文学活动的组织、文学队伍的构成等各个方面在内的、全面的、整体性的变化。这种状况是与此前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时期都不相同的；即便同为新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也迥异于此前十多年的文学。对此，学术界展开过多次关于“世纪之交文学”的讨论，理论界提出了“世纪之交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新状态文学”（并非专指以南京为中心的部分“新生代”作家的“新状态小说”创作）等概念，作为一种分期代码的理论描述。一篇学术会议的综述报道说：

王宁（北京大学）在研究了后新时期的理论依据和背景后指出，“后新时期”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专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分期的文化概念，因此，它的使用不必受制于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而主要受制于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和文学自身的运作规律。他认为，对“后新时期”这个文学概念的理解应当着眼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时间上的延续性和文学代码上的悖离性，后者的作用更为明显。从时间上来说，“后新时期”是伴随着“盛新时期”（1979—1989年）的终结而来的，但从文学自身的

运作轨迹以及文学文体内部的代码之更替来看,它则是与新时期逆向相悖的,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新时期文学主旨的挑战。这种挑战性和悖离性由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和商业文化合力完成。在“后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多声部的没有主流的时代。它一方面是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新世纪到来之前的过渡和中介。

同篇综述,就“后新时期”文学不同于此前文学的特点报道说:

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新趋势。张颐武(北京大学)认为,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文学大体上是一种“寓言化”的文学。在这种以“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奇异”为特征的寓言中,主体总是西方,而中国则总是客体。而进入 90 年代,文学开始从寓言中挣脱出来,用戏拟等狂欢式写作对寓言进行解构。为此,他提出“新状态文学”这一新概念。他认为“新状态文学”,是彻底告别寓言后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表现。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作者的位置由“俯视性”变成置身状态之中;第二,作家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象的拼贴;第三,修辞上将抽象表现与照相写实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一新的文学趋势,是对五四以来现代性的无情摧毁。(《20 世纪中外文艺思潮讨论会综述》《文学自由谈》1994 年第 3 期。同一报道的其他论题,也都多少与“后新时期”文学有关,这里不再摘引)

狭义“新状态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韩东的一段话,可以视做是对张颐武部分论断的旁证:“我们的个人生活与作品中的故事经常被搞得混淆不清,‘作家’和‘我’的角色纠缠在一起不能自拔,这就是一种‘交复感应’,它构成了写作上的动力。而其他作家则可能分得很清楚。通过这种叙述改变‘我’的经历,而经历又改变着叙述。

当我们重读时就发现现实中的‘我’与小说中的‘我’已经融合为一体了。”(《东方艺术》1996年第2期)王宁教授在一篇题为《后新时期与后现代》的文章中对所谓“后新时期”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个‘稗史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潮的时代’,一个‘多元竞争且又共生的时代’,一个‘浮躁的且又促使人思考的时代’,一个‘酝酿新的文学高潮的沉默的时代’,一个‘自由选择又令人困惑的时代’,一个‘想像力得到解放且又缺乏新的想像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丧失了大部分启蒙作用和劝诫作用,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其审美作用也受到颠覆。”(见《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无论这些提法、概念是否科学、准确,也无论他们在论述上存在着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世纪之交(或进入90年代以来)的文学是非常有特点的,与以前的文学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在文学领域,一个空前的革命已经发生。

第一章 现代革命正在发生

提到文学革命,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甚至会想到它的滥觞——19 世纪末以梁启超为领军人物的、那场同样轰轰烈烈的“文界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现在所要描述的、眼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场文学革命,和上一个世纪之交、前后 20 多年间所发生的那两次“革命”,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我的孤陋寡闻,尚不知道学术界如何从质上区分梁启超倡言的“文界革命”和胡适、陈独秀领导的“文学革命”。我指的不是纯政治性的阶级分析,也不是指文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的表达方式、言语方式的差别;而主要是指文学观念、文学运作方式、文学呈现形态以及文学事实上的社会地位和文学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以我看来,如果以这些作权衡标准,这两次“革命”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载道”,做思想、社会革命的工具和武器;文学和文学家都处于社会风潮的中心,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导向和叱咤风云的弄潮儿。那时,没有纯粹的文学活动;文学活动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各层次、各侧面的运动都相互融和在一起,而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等社会角色,也都往往程度不等地集于一人之身。如果剥离了特定的阶级属性,毛泽东对鲁迅先生的那段著名评价,其实

是可以大体用在他们所有人身上的。而我们这里所要描述的文学革命却不同,它恰恰是对这一切的颠覆;并且,由此带来以往所有文学和文学家的苦难与风光,在这场世纪之交的文学革命里也都统统化为乌有。文学成了极少数文化人的事,文坛成了“寂寞的文坛”,文学家在进行“无人喝彩”的“寂寞歌唱”。(这里借用的是评论家王干评述1997年中短篇小说的文章标题)用青年评论家李洁非的话说就是,“几千年以来,还没有哪一代文学家品尝过这种滋味”。(李洁非《寂寞文坛》,《中国青年报》1995年1月22日)在文学运作方式上,眼下的文学对企业的倚重性似乎更强烈;文学的呈现形态也有了一些变化,例如,各种载体间的不平衡性,而网络文学、各种电视文艺作品的文学文本等形态,更是此前所不曾有过的。这些,就是我们本章标题所说的文学的“现代革命”。

第一节 文学的边缘化

文学“边缘化”的惊呼,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已传遍整个文坛,人们在哀叹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的确,像《于无声处》、《曙光》、《丹心谱》、《陈毅出山》、《报春花》等那样,一出戏演遍全国;像《一月的哀思》(李瑛)、《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白桦)、《将军,你不能那样做》(叶文福)、《小草在歌唱》(雷抒雁)、《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舒婷)、《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等那样,一首诗获得亿万人的应和;像《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奇异的书简》(柯岩)、《大雁情》、《小木屋》(黄宗英)、《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等那样,一篇报告文学为全民确立榜样;像《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娟)、《李顺大造屋》(高晓声)、《黑旗》(刘真)、《月

食》(李国文)、《记忆》(张弦)、《西望茅草地》(韩少功)、《内奸》(方之)、《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布礼》和《蝴蝶》(王蒙)、《绿化树》(张贤亮)、《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乡场上》(何士光)、《西线无战事》(徐怀中)、《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人到中年》(谌容)、《人生》(路遥)等那样,一篇小说令洛阳纸贵、万民皆知;或者像《歌德与缺德》那样,一篇文章引发的争论遍及全国所有报刊;又像剧本《苦恋》及电影《太阳和人》、《女贼》、《在社会档案里》的争议那样,竟然惊动我们国家最高层领导,由他们亲口作指示、定规格、亲自部署批评,由中央直接出面主持召开座谈会的事,已是再也不会出现了。

“拨乱反正”之初,电影《巴山夜雨》走红全国,妇孺皆知。影片的中心人物、诗人秋石的命运牵动着全部剧中人,以及幕后的相当高层的掌权人物,似乎隐隐约约还为权力核心层所关注。或者毋宁说,这一切都正是权力最高核心个别人的意志及主观好恶使然。诗人固然只是被人押解的囚徒,是可能任人宰割的鱼肉;然而却是几乎整个世人关注的中心,甚至是正义力量的化身!这里不谈影片的得失,也不对具体情节的真实与否置评,仅以诗人、文学家所处社会的中心地位而论:他们的风光与蒙难,都为全社会所关注;或全民景仰,或“全民共讨”、“共诛”。这些都是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的。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全国人同看一出戏,如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年青一代》、《箭杆河边》以及后来的“样板戏”,读一部小说,如《金光大道》,一首诗,如《西沙之战》;全民批一本小说,如《刘志丹》,一部电影,如《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后来的《红河激浪》、《怒潮》、《燎原》等,一出戏,最著名者如《李慧娘》、《海瑞罢官》等,并从而令作者或表演者登政治高位出尽风头,或身陷囹圄甚至肉体被灭,如吴晗、老舍等的事,我们经见的还少吗?这的确是够“轰动”的;却也并不只是“文革”那个特殊年代才有的、“史无前例”